

76

世故與天真

李歐梵 著
舒非 編選



三 聯 文 庫

76

世故與天真

李歐梵 著
舒非 編選

三 聯 書 店（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香港三聯書店植根香港，本“竭誠為讀者服務”之傳統，傳播中華文化，介紹當代中國，反映香港歷史變遷，歷年出書品種累以千計。蒙諸多作者鼎力襄助，所出圖書不乏常讀常新之作。惟時有疏於重印，加之成本日昂，致使不少好書坊間難覓。值本店成立五十週年，從歷年出版書籍中遴選部分，並增編部分經典作品，以便攜開本集為《三聯文庫》，陸續重版，以饗讀者。切盼各界不吝指正。

責任編輯 蔡嘉蘋

三	聯	文	庫	76
書名	世故與天真			
著者	李歐梵			
編選	舒非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次	2002年8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特32開 (103×165mm) 160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2171 . X			
	©2002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自序	1
關於“二十世紀”的反思	5
二十一世紀：有眼睇	9
“慢”	12
一千年回顧	16
嚴肅不起來	20
香港：張愛玲筆下的“她者”	23
音樂藝術和同性戀	29
音樂和死亡	34
杜鵑·泣血·夜鶯	37
《九月》，夏日的遐思	41
聽馬勒第九交響樂	45
世故與天真	48
死亡	53
我的葬禮	57
變形記	60
重讀卡夫卡《變形記》	63
“象牙塔”內的臆想	66
書債	75

“愛之喜”・“愛之悲”	79
安格爾的家園	87
爛漫餘情人似玉	95
附錄：一起看海的日子（李歐梵／李玉瑩）	102
布拉格一日	106
巴黎日記	135
我的依荷華	139
編後記	143

自序

在舒非女士敦促之下——又經過她悉心的挑選——這本小冊子才得以問世。作為這些文章的“始作俑者”，我一向對自己的舊作不忍卒讀，然而此次選出來的文章，卻勾起我不少情緒上的波動，因為它們大多和我過去某些特定時空中產生的情緒有關：父親李永剛和當年岳父安格爾的去世；自己因背痛而卧地重讀卡夫卡；重遊布拉格時的百感交集；世紀將盡的那幾天，在我心靈上所感受的逼迫……那都不是很平靜心情下的作品。董橋先生曾經指我的“學問”是行萬里路之後才“走”出來的，此言不虛；我甚至還要加上一句：我的散文和雜文也是在經歷各種不同的境遇後有感而發的。可是我總覺得人生有些東西，當事過境遷之後，就煙消雲散了，況且我向來認為自己的文章沒有什麼存留的價值。

然而，舒非女士卻對這些文字特別偏愛，並以選集形式編輯存留，這當然令我十分感激，但又覺得這些“私情”再度公諸於世，有點不合時宜——因為二十一世紀的這一代華文讀者可能不喜歡這種半抒情半議論的模式：它似乎筆鋒常帶感情，但昇華後的感情

又未免太過抽象或不着邊際；它雖有感而發，卻不痛快淋漓；它像是有學理根據卻又缺乏精闢的論證；而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它的文體太過簡潔缺少文采（style），偶有妙筆卻不能生花。這些缺點我都承認，但也不得不承認這也是我刻意製造出來的效果。和所有現代人一樣，我時時要故意收斂自己奔放的感情，更時時自嘲，生怕這個“自我”在行文中太過膨脹，可又無法泯滅這個自我而作純客觀的論述。於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我的這種文體就應運而生，到底是好是壞，也只能由讀者自作取捨了。

在思想內容上，這些文章未免沾有一點“洋味”，這也是個人經歷所造成。長年在美國任教，雖然專業是中國現代文學，但時勢所趨，也看了不少西方書籍——包括文學和文化理論，所以在思想上關懷的問題（譬如“現代性” modernity）往往都和我閱讀的外國理論有關。可自己又不願受到西方理論的桎梏，因此用中文寫雜文對我是一種心靈上的解放。雜文的文體使我不必遷就那些理論的框架，得以自由的發揮，但是理論的陰影還是藏在腦後，不時趁虛而入，這個集子的前幾篇文章，都是在兩種焦慮——世紀末的時間焦慮和現代性的理論焦慮——影響下寫出來的。我認為某一種論述或敘說就應該有某一種文體，在一篇雜文中用理論方式說大道理，絕非這種文體所能負荷，然而我又不願用詰屈聱牙的學院文體寫不中不西的理

論文章，所以多年來我的中文作品都是非學術性或略帶學術性的小品文或雜文，和其他學者（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學者）相較，我的文章也顯得太“輕”了一點。

“輕”和“重”這兩個觀念，本來出自昆德拉的小說，近年來被人不斷沿用之後，似乎有避重就輕的趨勢，然而故意輕描淡寫，並不一定能使文章生色；故意迴避重大問題，也會顯得沒有思想深度。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如何選材如何寫，這是所有作家面臨的共同問題。我的性格和經驗，使我無法寫出長篇大論式的“刺猬型”作品，所以往往作“狐狸遁”：以文章的篇幅限制為藉口，常常對重大問題——譬如“現代性”——點到即止，不繼續發揮。從學理的立場而言，這是一大弱點。我想大部份的讀者，也不想從這些文章中汲取過多的學識養分，而是更想從中“偷窺”一些個人心靈上的經驗，即便如此，我也心滿意足了，因為我最關心的學理問題就是一種文化上的“感性”（sensitivity），這種感性目前在西方文化理論上反而沒有受到注意，所以也無高深的理論可以爰引，我只好另起爐竈，想從雜文寫作的實踐中提煉出一點理論思緒，也許可以有助於我將來的學術論述，目前還在試驗階段，理論上是否能成型，目前言之尚早。然而在寫作的過程中，卻不知不覺地把個人的感性流露出來了，這一個感性的自我，並非捏造，但也

非隱私，只不過是一種經過思想和語言過濾後的真性情，而真性情一向是我待人處世的座右銘。

以上的這一番話，既非自剖，也不是自辯，而是舒非女士向我提出的交換條件——我請她全盤負責編選，她要我寫一篇新的自序。走筆至此，也應該鞠躬下台了。在此再次感謝舒非女士和香港三聯書店的厚意，使我的這些文字又得到一條新生命，但願也能為厚愛我的讀者帶來些許新的樂趣。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於香港沙灣徑

關於“二十世紀”的反思

每次經過銅鑼灣時代廣場見到“邁向二十一世紀”的熒光幕，我都會膽戰心驚，熒光幕上閃出“尚有××天”的數字，更令我有大限已到的感覺，好像自己的生命也只剩下這麼幾天了，應該趕快打點收拾未了的事，以便從容對待世紀終結日。

對我來說，千禧年毫無意義，不知“禧”從何來，而英文 Millennium 這個詞源出基督教，意指耶穌即將再世以拯救受苦受難的世人的時刻，所以也無邁向將來的喜意。至於二十一世紀何時開始，至今尚未定論，有人說是公元二〇〇〇年的一月一日開始算起，也有人說須要等到二〇〇一年才開始。對我而言，何時“開始”也毫無意義，我最關心的反而是何時終結。所以，我打算討論的就是一個終結的問題——The sense of an ending。

所以就我看來，時代廣場熒幕上所標示的日子，不應作還有若干天就可進入二十一世紀來解釋，而只能看做二十世紀馬上就要終結的提示，真是有點時不我與，連我也要計算時間了。

其實，我認為所謂“現代性”（modernity）的關

鍵問題就是時間，而西方的時間觀念如何被中國接受，進而導致中國的“現代化”，也是一個值得仔細研究的問題。世紀（century）和“千年”都是西方時間觀念的一部份，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本無太大意義，特別是前者，在晚清以前，從來沒有中國人提過。然而，到了光緒年間，“十九世紀”這個名詞有人用了，甚至有一本西方歷史書：The 19th Century: A History（原著者是 Robert Mackenzie），經由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節譯，以《泰西近百年大事紀》為題（並未譯出“十九世紀”這個名詞）在一八九四年的《萬國公報》上連載，次年又以《泰西史攬要》為名，由廣學會出版單行本，影響至大。梁啟超讚道此書：“述近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見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102—103 頁）

於是，西方的現代歷史和時間觀念逐漸滲入中國知識份子的腦中；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二氏流亡日本，對於天朝典章制度開始感到失望，於是刻意求變。一八九九年底，梁啟超由日本啓程到夏威夷遊歷，在太平洋途中，風浪大作，也引起他的澎湃思潮，遂在這本日記《行漫錄》序言中寫道：“余鄉人也，九歲後始遊他縣，十七歲後始遊他省，了無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幾何時，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顛簸、所衝擊、所驅遣，使我不得

不爲國人焉，不得不爲世界人焉。”他自己既然立志爲世界人，所以毅然決定採用西曆，在日記的第一天標明時間是“西曆十二月十九日，中曆十一月十七日”，正是十九世紀最後的那幾天。然而當時的中國城市——包括上海——並沒有任何顯明的標誌，“邁向二十世紀，僅有十二天”。

梁啟超甘冒“不愛國”的風險使用西曆，主要是求其方便，他說中國已經與世界交流，應該使用世界公用的東西，其後他還提到麥哲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貢獻，以此自比，把自己想像的空間推廣到全世界。從此以後，中國人的時間和空間觀念開始逐漸改變，直到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後，公佈使用西曆，當時有不少人反對，所以商務印書館還出版了幾本新曆法的書，以教國人。

到了五四時期，世紀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了，我常引用一篇陳獨秀的文章，以爲佐證，題目就叫做《一九一六年》，全文開端的幾句話如下：

任重道遠之青年諸君乎，諸君所生之時代，為何等時代乎，乃二十世紀之第十六年之初也。世界之變動，即進化，月異而歲不同，人類光明之歷史愈演愈疾，……而現代二十世紀之文明，其進境如何，今方萌動，不可得而言焉。然生於斯世者，必昂首自負為二十世紀之人，創造二十世紀之新文明……人類文明之進化，新陳代謝，

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時時相續，時時變易，二十世紀之第十六年之人又當萬事一新……

這種樂觀的論調，可以說代表了五四“新青年”那一代知識份子的心態。時當民國五年，正是萬事一新的時候，所以對時間的看法也是新的，認為是直線前進的，而現代文明和歷史發展的節奏，也“愈演愈疾”——快得令人喘不過氣來。當年陳獨秀可以“昂首自負”，聲勢奪人，然而到了世紀末，我們發現這“二十世紀之新文明”並沒有帶來全面進步的結果，世紀初知識份子的驕傲和樂觀，令我不敢苟同，甚至覺得慚愧，所以只能俯首反思，匆匆寫下這篇短文。

(1999年12月1日)

二十一世紀：冇眼睇

德國哲學家本雅明曾經創造了一個天使的形象：他所說的天使，往前走的時候，只能回顧。我對本雅明的著作不夠熟悉，但這個意象卻一直縈繞在我的腦際。我對於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就採取這個“回頭看天使”的態度：不願前瞻，只有回顧。

老友劉紹銘最近說了一句妙語，值得引用，他說對二十一世紀“冇眼睇”（沒看頭），我想這句廣東話也恰好印證了本雅明。將來如何，我有眼睇，我的眼只看到過去的歷史，我看到的是二十世紀一代代中國知識份子，眼睛都長在頭前面，永遠是往前看，高瞻遠矚，把一切寄希望於未來。所以，他們才會製造出一連串的烏托邦幻象，而且竟然自以為是，以國家民族為己任，說起大話來，從五四到“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嚷了將近一個世紀，到了世紀末，得來的卻是烏托邦的徹底幻滅。

也許，我們真應該把眼睛長在頭後面，由此而看清歷史上的浩劫，由此而徹底反省。

走筆到此，本可以打住，但編者卻要我“為全球中文讀者寫出新世紀、新千年的第一篇”——理應展

望將來一番才是，好在編者的約稿信中也提到，這“不是應時之作，而是對舊世紀的批評和對新世紀的期待與預言”。換言之，可以前後兼顧，頭前頭後各長一對眼睛，我卻沒有這麼多眼睛，但也只好勉為其難。

其實，對舊世紀的批評，該說的話也已說盡，而對新世紀又無任何期待可言，如何是好？遂想到一個“怪招”：暫時不承認新千年，也不承認“世紀”的計時法，因為兩者皆是西方的傳統，中國文化中從來沒有“世紀”的說法，直到十九世紀末梁啟超乘船到夏威夷的時候，才突發宏願，要採用西曆，時當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正是上個世紀末。到了現在，我們可以不必一切以西方馬首是瞻，一味慶祝，所以我在此提出一個折衷辦法。

既然對於二十一世紀何時開始有爭論（有人說從公元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開始），我提議把這一年（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一）作為一個“延期償付時期”（moratorium）——一個反省的時期，盡可能地閉門思過，從以下三大主題作反思：

一、到底“現代”（modernity）的意義是什麼？如果想不通，則暫時不必討論如何才是“後現代”的問題。

二、二十世紀政治最大的遺產是“民族國家”的模式。這個模式已經發展到了盡頭，在華人的祖國卻

仍然方興未艾，然而它是否在二十一世紀仍能適用？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應徹底檢討“民族國家”引發的種種影響，諸如民族主義、愛國情緒、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政府可以代表國家主權的思想、大一統的觀念等等。如果對於這些問題都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真理”，那麼我們只好盲目地面對二十一世紀（盲目和“有眼睜”畢竟是兩回事）。

三、既然有人對“千禧年”有所期待，我們不妨也可以參照《紐約時報》週日版雜誌（十二月五日）的做法，為公元三千年的人類設計一個“時代庫”（time capsule），藏在地底保存下來，讓三千年時期的人知道我們這些文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紐約時報》向世界各地徵求意見，但似乎沒有顧及到華人。我建議《明報月刊》越俎代庖，向世界各地華人徵詢意見：應該把什麼中華文物放在這個庫裡？以二十世紀為限，物質和精神文明可以兼具。我一人應徵的文物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武鬥的鮮血沾滿的一塊石頭，石頭下面是一首保羅·安格爾的詩：

我的手拾起一塊石頭。
我聽見一個聲音在裡面吼：
“不要惹我，
我到這裡來躲一躲。”

（2000年1月）